



北京语言大学语言科学院学人书系

词义结构和词语调节的 认知研究

施春宏 著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PRESS



北京语言大学语言科学院学人书系

词义结构和词语调节的 认知研究

施春宏 著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PRESS

© 2015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社图号 15205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词义结构和词语调节的认知研究 / 施春宏著 . -- 北京 :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2015.12
ISBN 978-7-5619-4289-5

I. ①词… II. ①施… III. ①词义学—文集 ②语义学—文集 IV. ① H0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92376 号

词义结构和词语调节的认知研究

CIYI JIEGOU HE CIYU TIAOJIE DE RENZHI YANJIU

排版制作：北京创艺涵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责任印制：姜正周

出版发行：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15 号, 100083

网 址：www.blcup.com

电子信箱：service@blcup.com

电 话：编辑部 8610-82303647/3592/3395

国内发行 8610-82303650/3591/3648

海外发行 8610-82303365/3080/3668

北语书店 8610-82303653

网购咨询 8610-82303908

印 刷：北京九州迅驰传媒文化有限公司

版 次：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19.75

字 数：292 千字

定 价：65.00 元

PRINTED IN CHINA

谨以此书献给敬爱的刘传翠先生和王麟沚先生
并纪念我的母校——安徽省宣城师范学校

序

今年3月7日，施春宏教授发来邮件，嘱我给他的词汇语义学论文集《词义结构和词语调节的认知研究》作序，我深知断无资格承命，可作为相知较深的朋友，又按捺不住地想抒发对春宏教授为学为师的钦敬，于是，在依违两难中做出不自量力的应从。

我最早认识春宏教授是在2004年。那一年，受崔希亮总主编之命，我负责编辑《北京语言大学汉语语言学文萃》的“词汇卷”，收录了施老师4篇词汇语义学论文，即《名词的描述性语义特征与副名组合的可能性》《比喻义的生成基础及理解策略》《词义的认知模式与词义的性质及构成》《说“界”和“坛”》。这几篇文章新颖的语义分析视角、深邃的理性思辨和洞见以及周详严密的逻辑论证，着实令我叹服。

2004年以后，我又陆续拜读了施老师多篇词汇语义学论文，并和学生一起研读讨论了某些篇章，受益良多。此次受命为序，重读了施老师的大作，又有不少新的体会。我个人感觉，跟我们较为熟悉的词汇学论著相比，春宏教授的词汇语义学研究可谓独树一帜，最令我佩服的特色有两点：

一是认知语言学与词汇语义学深度融通的理论取向。以往的词汇语义研究通常关注的是词义有哪些构成要素，词义成分的性质、关系及层级如何，词义演变的结果是什么，新义与原义有何区别与联系等等，这些都属于词汇语义学范畴内从意义到意义的研究。近年来，随着认知语言学的发展，将认知研究与词义研究相结合的成果日益增多。从总体上看，英语学界偏重于用词义衍生现象例示或诠释认知语言学的基本概念和原理，汉语学界偏重于用认知语言学基础理论来解释某些汉语词义衍生现象和规律。春宏教授的研究则改变了这种畸轻畸重的“结合”模式。他深刻地认识到，人类认知

的倾向性以及由此引发的语言结构化原则具有一致性特征，因此，自觉地将词汇语义学的词义分析模式和基于概念认知的分析模式有机地结合起来，将认知视角贯穿于词义生成、衍化及释义等各个层面的研究，使词义的结构特征和衍化规律与人类的认知经验、过程和模式互为参照，彼此证发。最能体现认知语言学与词汇语义学理论深度融通的是列于本文集之首的《词义结构的认知基础及释义原则》。在这篇文章中，春宏教授首次从理论上系统地论证了词义形成和衍生的认知基础和过程，指出词义的生成是认知过程结构化的结果，揭示了词义成分如何经过认知上的选择性信息加工得以在语言系统中定位，词义结构关系衍生过程的拓扑性特征如何受制于意象图式的类型性特征等等。该文以及整部文集的这种理论取向和相关见解令人耳目一新，有力地推动了词汇语义研究由“知其然”向“知其所以然”深进。

二是富于理论创新精神和理论建构能力。语言的语音和语法系统相对封闭，规律性较强，通常被视为更适宜创建理论的研究对象；而词汇系统无限开放，动态性强，词义的演变尤为灵动歧迷，这使得有关词汇语义的理论探究向来被视为畏途。而通观春宏教授的词汇语义研究，则显示出鲜明的理论追求和强大的理性魅力。读他的文章，你会被一种思辨的力量所牵引，踏着一个个熟知的词语不知不觉地进入闪烁着智慧之光的理性世界。春宏教授从不满足于对词汇现象的简单描写，也不会拿典型案例去给既有理论充当“脚注”，而是基于对词汇语义现象的精细观察，由表及里，见微知著，力求提炼具有较强概括性的词义结构特征，揭示富有解释力的词义演变、词语语义调节及显隐的深层动因，构建更具可操作性的词义分析模型。他所建立的“关涉性语义成分”和“描述性语义成分”（详见《名词的描述性语义特征与副名组合的可能性》等），“语义演变”和“语义用变”（详见《关于成语用变和演变的思考》等），“词语构造的多能性和时空性”、词语的“空位”“占位”及“让位”（详

见《说“界”和“坛”》)等一系列理论范畴，不仅为汉语的语义成分结构化、语义空间的动态性以及词语调节的动因与机制研究提供了新的分析思路和视角，而且还具有语言类型学上的普遍意义(详见《试析名词的语义结构》)。

春宏教授研究词汇语义还有许多不同凡响之处，例如结合语言运用实际和语言规范化研究词汇语义，既依托辞书释义分析词义结构，又用词义分析模型反哺辞书释义原则和释义模式的建构等等。限于自己的学识水平，不便在此过多地妄加述评。接下来我想说的是，春宏教授还是我特别钦佩的好老师、好编辑。

施老师 2006 年从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来到对外汉语研究中心，到 2013 年底离开中心任《语言教学与研究》副主编、主编。我和他共事七载，亲身领略了他的为师之德与为师之道。他热爱教学，从不因为做研究而放弃教学。在我们这个研究单位，春宏教授从来都是上课最多的老师。他对教学工作非常投入、负责。记得在一个初冬的早上，他因受风寒而出现面瘫症状，嘴巴歪到了一边，当时我都不忍目睹他那面目全非的样子，力劝他赶快去医院治疗，可他硬是歪着嘴讲完了两节课，还打趣说：“我这是歪嘴和尚念经。”他指导研究生更是不惜气力，我不止一次地听说，某某同学的论文经施老师改过十几遍。2007 年以来，施老师指导的硕士研究生独立署名或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的基于硕士阶段研究成果的论文就有 20 篇之多，其中多发表于《世界汉语教学》《语言教学与研究》《语言文字应用》《当代修辞学》《语言科学》《汉语学习》《辞书研究》《华语教学与研究》等语言学专业期刊，例如蔡淑美《双量式“A 就 B”的语义理解问题》、张春华《新词语构造的合力机制》、白鸽、施春宏《〈现代汉语词典〉中作格动词释义情况的考察与思考》、李昱《语言共性和个性在汉语双宾语构式二语习得中的体现》、郝暾、施春宏《历年高考病句试题的演变路径及理论分析》等(详见对外汉语研究中心施春宏教授的个人主页 <http://www.dwhyyjzx.com/www/?id=22>)。透

过这些高水平的学术论文和多位语言学新秀的名字，人们看到的或许只是施老师点石成金的人才培养之功效，殊不知其背后凝聚着多少既授鱼又授渔的心血。2009年9月至2013年10月这段时间，因工作需要，施老师受邀在《世界汉语教学》做兼职编辑，我们又有机会在一个更小的团队中合作。且不说施老师审稿见识之高，编辑校对之细，让我们向他学到很多；最值得我们学习的，还是他对作者、对学术研究发自内心的尊重。只要是有新意或基于认真研究的论文，不论写作上多么不成熟，施老师都不会轻易否定，总是建议给作者修改提升的机会，甚至不惮其烦地亲自指导作者深化研究并完善论文。从施老师身上，我们深切地体会到做编辑工作应当怎样“与人为善，与人同善”。

春宏教授比我年轻十岁，可从打认识他以后，就发现要向他学习的地方太多。这篇文字无法表达我的感佩于万一。回到这部文集，我想告诉研修词汇学的青年朋友，研读施春宏教授的文章，一定会使你增广见识，开启心智，得到不同寻常的理论收获。

是为序。

张 博

2015年11月3日

目 录

序（张博） / III

上 编 词义结构和语义空间研究 / 1

词义结构的认知基础及释义原则 / 3

词义的认知模式与词义的性质及构成

——兼谈成语的性质 / 33

名词的描述性语义特征与副名组合的可能性 / 45

试析名词的语义结构 / 72

比喻义的生成基础及理解策略 / 88

附文：用用看 / 105

说“界”和“坛” / 109

附文一：“界”“坛”词缀化辨 / 121

附文二：“操坛”一词的是与非 / 126

词语搭配中的语义认知空间问题 / 132

下 编 词语调节和语义用变研究 / 141

词语调节过程中的语义关系分析 / 143

词语构造的多能性和时空性

——从“腰封”及其相关词语的形义关系谈起 / 163

重叠形式的可能性和现实性

——以阎连科作品中重叠形式的使用为例 / 181

试论语义关系对异体词显隐和使用的制约 / 201

修辞表达中的语义调节 / 222

关于成语用变和演变的思考

——从几则成语的现实使用谈起 / 237

附文：“关于成语用变和演变的思考”补议 / 255

词语变用中的语言游戏 / 259

语义叠架原因论析 / 270

“悬殊”用法的描写和分析 / 285

后记 / 294

上 编

词义结构和语义空间研究

词义结构的认知基础及释义原则^{*}

摘要 本文主要探讨词义形成和衍生的认知基础和过程，并以此为基础阐释辞书释义中的认知原则。文章首先通过具体用例的释义分析来说明词义结构中的认知属性，接着探讨词义结构生成的认知基础，指出词义的生成是认知过程结构化的结果，词义构成成分在认知凸显中定位，词义结构关系的衍生过程具有拓扑性特征。在此基础上，文章概括了词语释义应该遵循的一些基本认知原则：认知理据的完备性原则、认知因素的结构化原则、认知机制的一致性原则。本文试图借此对认知语义学和结构语义学、词汇语义学等传统词义分析方式之间的关系做出新的思考。

认知语言学的兴起引发了人们对日常经验与语言表达之间关系的广泛重视，激发了以意义为中心的语言研究。就语义结构形成的基础和语言表达形式的构造而言，这种基于概念化、范畴化、认知图式、象似性、隐喻机制、认知推理模式等的研究大大调整，强化了人们对语言理据性的认识，将人们从过于重视语言表达形式和语义结构的内部形式的分析转移到对其生成理据的探讨，从而深化了人们对语言系统认知属性和功能的分析。尤其是基于隐喻理论的理解和分析，更是将语言表达形义之间的关联更加系统化了，从而大大推进了语义和词汇的研究。（如 Johnson, 1987; Ungerer & Schmid, 1996; 张敏, 1998; 王寅, 2007; 束定芳, 2008 等）就语义的隐喻分析而言，目前认知语言学较多地关注“时间就是金钱”(time is money)、“争论犹如战争”(argument

* 本文原刊于《中国语文》2012年第2期，详摘内容转载于《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12年第6期。

is war)、“快乐则情绪上扬；悲伤便情绪低落”(happy is up, sad is down)之类基础隐喻所衍生的隐喻集合，强调相关隐喻的拓展情况及隐喻对语言生成和语言理解的深刻影响，并对一词多义多用现象做出系统的刻画。(如 Lakoff & Johnson, 1980; 束定芳, 2000; 胡壮麟, 2004 等)然而，我们也注意到，很多基于认知隐喻的研究对传统的语义构成成分分析有意无意地采取了相对漠视的态度，忽视了结构语义学、词汇语义学等相对传统的语义分析方法与模式在新的语言学理论背景中的价值。^①如果将基于语义 / 词义成分研究的分析模式和基于概念认知的分析模式有机地结合起来，便能够对相关词义结构的拓扑 (topology) 机制做出更为系统的分析，对具体词义的语义成分做出更为精细的考察，从而进一步强化词义结构分析的可操作性，提高词义分析的描写力和解释力以及一定程度上的预见力，并进而提高辞书释义的准确性和可接受性。本文即试图对此做出探索。文章首先通过具体用例的释义分析来说明词义结构的认知属性，并在此基础上探讨词义结构生成的认知基础，进而提出词语释义应该遵循的一些基本认知原则。关于词义认知隐喻研究的文献相当丰富，创见颇多，但大多考察其隐喻路径、结果及其文化意义，而较少具体到词义结构内部的成分及其关系的分析。本文正侧重于此，并以辞书释义的分析作为行文的出发点。

一 从“驴”字词语群的释义情况看词义结构中的认知属性

本义和派生义（比喻义、引申义 / 转喻义）之间的关联一直是词义研究和

^① 在认知语言学 / 认知语义学产生广泛影响之前，基于词义的语义研究主要以结构语义学和词汇语义学为主，特别关注语义结构成分（尤其是语义特征）及其关系的分析。汉语研究也是如此，如符淮青 (1996)、贾彦德 (1999)、石安石 (2005)、张志毅、张庆云 (2001) 等。这种研究对词语的“内部形式”即形成理据也很关注，如张永言 (1981) 等的研究就已相当深入，而且这样的研究常常跟辞书释义相结合。

辞书释义关注的焦点。^①然而，我们平时在查字典词典的时候，发现有的派生义理解起来不是太顺畅。这是因为，辞书要么没有提供本义或特定的描写、说明，读者不容易发现派生义的比喻之源、引申之本；要么提供的本义或特定的描写、说明跟所释的派生义联系不紧密，读者不容易从本义自然地推导出派生义来。这样就可能会导致词义认知上的短路。

为此，我们翻检了一些比较有影响的辞书，如《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以下简称《现汉》）、《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语文出版社，2004年版；以下简称《现规》）、《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版）、《辞源》（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新华词典》（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应用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以下简称《应用》）等，在比较分析中发现，在这个问题上存在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由于《现汉》在辞书界具有标杆性的地位，下文的释义便以之为基础。^②

这里先以“驴”字词语（即含有“驴”字的词语）构成的词语群（或称作词群，word group）为例来说明。这个词语群较为系统地彰显了辞书释义中的若干层面值得反思的问题。我们先来看《现汉》对“驴”及相关词条的释义（注音略，下同）：

【驴】哺乳动物，比马小，耳朵长，胸部稍窄，毛多为灰褐色，尾端有毛。多用作力畜。

这基本上是从生物学角度所作的释义。看了这个释义，我们对驴是个什么样的动物便有了一个初步的印象。这个字头下列有8个词，除了“驴骡、驴皮

^① 传统的词汇学、词义学将由本义衍生出来的派生义分成比喻义和引申义两大类型。其实，如果就系统而言，比喻义也是引申义，即引申义和派生义是同一内涵的概念。而跟比喻义相对的传统引申义一般可以看作转喻义（或转指义、借代义）。比喻义和转喻义同属派生义，这样的区分更具逻辑性。

^② 吕叔湘、胡绳等（1996）、韩敬体编（2004）、商务印书馆辞书研究中心编（2009）等系统总结了《现代汉语词典》的编写经验和成就，请参看。也有不少文献对《现代汉语词典》的释义情况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这些意见基本上是基于结构语义学的理论背景。

胶、驴皮影、驴子”外，还有 4 个熟语词：“驴唇不对马嘴、驴打滚、驴肝肺、驴年马月”。这 4 个词的释义是这样的：

【驴唇不对马嘴】比喻答非所问或事物两下不相合：这个比方打得不妥当，有点～。也说牛头不对马嘴。

【驴打滚】①高利贷的一种。放债时规定，到期不还，利息加倍。利上加利，越滚越多，如驴翻身打滚，所以叫驴打滚。②食品，用黄米面夹糖做成，蒸熟后，滚上熟黄豆面。

【驴肝肺】比喻极坏的心肠：好心当做～。

【驴年马月】指不可知的年月（就事情遥遥无期，不能实现说）：照你这么磨磨蹭蹭，～也干不成。也说猴年马月。

如果我们根据上面对“驴”的释义（甚至不需要具体了解“驴”的特征），理解“驴唇不对马嘴”似乎不怎么困难。“驴唇”和“马嘴”分指两种动物的口部器官，两者不能相合是自然的。用“驴唇不对马嘴”来比喻两个事物（如问与答、此事与彼事、表象与真相等）相悖相对是一种自然的隐喻性认知过程（从具体认知域到抽象认知域）。本义（源语义）和比喻义／引申义在构成成分和结构关系上的一一对应，使得该词的理解路径比较显豁。^①

然而，其他三个词就不是如此简单明了了。它还需要补充别的方面的知识。为什么呢？显然，词语释义中提供的相关信息是否充分跟我们对词义的理解和把握有很大的关系。就这些词语的理解而言，似乎还需要有关“驴”的其他方面的经验知识，如果读者缺少这方面的知识，理解的通道就没有完全打通。例如，为什么可以用“驴打滚”来比喻高利贷呢？上面的释义中有一个提

^① 《现代汉语词典》对词语的比喻义和比喻用法的关系在释义中做了系统的处理（参见韩敬体，2001），体现了两者之间的发展层次，从一个角度展示了辞书释义的大原则。另，首都师范大学博士生马玉红向笔者指出，还有“驴头不对马嘴”和“驴唇马嘴”这样的表达，如：“倘或一时间及，驴头不对马嘴，就要弄出本色来了。”（明·董说《西游补》第五回）“驴唇马嘴夸我解问，十转五转饶你从朝。”（宋·释道原《景德传灯录》卷十九）感谢马玉红同学的意见。

示：“利上加利，越滚越多，如驴翻身打滚。”然而，这还是不够明确，为什么驴子翻身打滚了就可以比喻“利上加利”？这“加”的部分不好理解，难道指滚的次数在增加吗？似乎不尽然。可见，上述释义尚未提供充分的相关信息来帮助我们理解和把握词义结构。其实，“驴打滚”的第二个义项倒可以帮助我们获得更加切近的认识。它用来指一种食品，这种食品“蒸熟后，滚上熟黄豆面”，而且每滚一次，沾上的黄豆面就越多，这样滚下去，自然越来越多。这与驴子在泥地里打滚时越滚身上泥土越多的情况在认知经验上是相通的，也正是人们用“驴打滚”来命名该食品的依据。同理，高利贷亦有“越滚越多”的特征，故也可用“驴打滚”来比喻。这是合乎一般的认知过程的：从生活经验扩展到其他领域（如这里的食品领域、经济领域）。对词义结构的认知，既包括结构本身的成分及其关系，也包括认知建构过程的加工序列。词义是建构而成的，语言交际就是一个逐步建构的过程。一旦我们对命名的依据认识清楚了，将词义结构中的语义成分及其关系分析到位了，从而建立了词义的结构，对词义的理解便会豁然开朗。可见，我们在释义时如果介绍了驴子生活习性方面的这种特征，那就更有利于读者对词义的认知、理解和使用。我们翻检了收有这个词的《现规》《辞海》《应用》，释义基本与《现汉》一致。^①

我们再来看“驴肝肺”，上面“驴”的释义内容都不能成为我们准确理解这个词语意义的线索。为什么“驴肝肺”能比喻极坏的心肠呢？为什么就不能用它来比喻好心肠？这仅仅是所谓的“约定俗成”的偶然性吗？^②考虑到这个

^① 就义项的设立而言，作为生活经验的“驴打滚”不宜作为一个独立的义项，只能作为“造意”的基础。这牵涉到结构的意义和词义的关系。（谭景春，2000）基于生活经验的“驴打滚”还只是一个句法结构，而不是词汇性单位。至于食品名称义和高利贷义之间的关系，如果注重于时间先后，则是连锁式关系；如果认为它们都可以直接从生活经验引申而来（哪怕出现的时间有早晚），则两者之间就是辐射式关系。

^② 很多文献将“约定俗成”理解为无需理据支持，用得多了，也就“定”了“成”了，即便当初为“非”，后来也积非成是了。这种“懒政”思维跟实际交际并不相合。其实，所谓的约定俗成，并非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而是有很强的理据性的，只不过有时我们在认识上一时不到位，就被看作积非成是了。